

第三章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城鎮就業的現況

第一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況

人口的過快增長導致發展中國家嚴重的失業，在農村，技術水平較落後，土地又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長必然導致勞動力過剩，一部分剩餘勞動力流入城市引起城市失業的增加。人口的過快增長還會使人力資源的質量降低，這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增加了扶養和教育費的壓力，而家庭和國家的財力都是有限，甚至是很低的，因而導致了很多社會問題，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中國大陸 2001 年的總人口為 12.76 億¹。自 1970 年代中期推行計劃生育的政策以來，目前的人口增長，已逐步偏向自然增長率為零的方向，總體發展已逐漸步入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的階段，令中國具備充分條件，在 2030 年達至人口零增長的目標²。控制人口增長是確保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首要戰略。而中國大陸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配合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因應過快的都市化過程。因此在都市人口上，抑制大都市人口增長，鼓勵中型都市和小城市的人口發展。另外在管理

¹ 國家統計局，2002 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國家統計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93。

² 「中國的人口問題」，<http://203.198.70.29/schfac/libr/4923.htm>。

上，遷移至大都市採取嚴格限制，而鼓勵大都市人口移出至地方都市甚至至農村地區。³

中國大陸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剩餘的發展中國家。中共在現代化過程中要完成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現代經濟的轉變。在廣大的農村，是屬於勞動力資源相對於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大大過剩的情況，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同村勞動力供給的增長一直快於農村經濟發展的勞動力的需求。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中共一方面透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和其他配套性措施把農村勞動力限制在土地上，另一方面透過實施以集體化經營和平均工資為特徵的人民公社制度，以維護低效率的就業均衡。如此，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被嚴格限制，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表現為隱性失業狀態。⁴

自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共當局放棄了傳統的「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大陸城鎮地區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因而愈來愈凸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傳統的「低工資、多就業」政策使得企業吸收過多的勞動力，導致就業不足或不充分就業的問題，增加企業的勞工成本，影響企業的經營效益。隨著改革的步伐向

³ Goldstein Alice & Goldstein Sidney, "Migration in China : Methodological and Policy Challeng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Beverly Hills [etc.] Sage [etc.]), vol.11, no.1(1987), pp.88-89。

⁴ 袁志剛、方穎著，中國就業制度的變遷（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292。

前推進，市場經濟的作用愈大，企業冗員過多所產生的效益不佳問題也愈為明顯。

第二是企業改革造成職工下崗的問題。冗員過多是導致國企經營效益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為了改善國營企業經營效率，裁汰冗員成爲不可避免的手段。近年來國企改革積極推進，「破產、拍賣、兼併、重組」的企業愈來愈多，因而企業職工下崗的情形愈來愈普遍。這些下崗職工大部份仍然與企業維持僱傭關係，不過實際上卻沒有工作可做，可稱得上是變相的失業者。

第三是公開性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大陸長期實行「統包統配」的勞動力就業制度，隱藏了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問題。然而，自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尤其進入 1990 年代，城鎮地區隱性失業問題逐漸公開化，此項公開性失業問題且有逐漸惡化的跡象。下崗職工要求再就業、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入城鎮和勞動力人口自然增加等三個因素，是導致城鎮地區就業壓力驟升，從而公開性失業問題惡化的主要原因。⁵

人口和勞動力的流動，是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各界關注的社會現象。在這以前，城市和鄉村被一系列制度所隔絕，人口遷移由公安系

⁵ 高長，「中國大陸城鎮勞動力就業問題之探討」，遠景季刊（台北：2000 年 10 月），未來中國研究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quarterly/pq2000-4/pq2000-4_3.htm。

統嚴格管理和控制，勞動力流動也受到勞動、人事部門的統一計劃配置。因而，城市、鄉村人民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成為互不相干的兩個部分。因為長期隔絕和缺乏了解、溝通，當農村人口中的一部分為追求更高的收入湧入城市時，城市居民以極大的陌生感看待他們身邊的外來客。不盡相同的生活方式，日益擁擠的街區和交通，潛在的就業競爭，甚至似乎提高了的犯罪率，使不少城裡人感到不快。與此同時，城市管理當局也同樣缺乏管理外來人口的經驗，面對洶湧的「民工潮」而頗感無奈。一旦有所反應時，採取的往往是限制、約束甚至是排斥性的對策。⁶

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大力發展以鄉鎮企業⁷為主的非農產業，轉移了1億農村勞動力。鄉鎮企業以年平均20~30%成長速度向前發展，年均吸納近600萬人。但是，鄉鎮企業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在東部和大城市郊區，鄉鎮企業已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有的農村，農民收入的80~90%來自鄉鎮企業，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了95%以上。在

⁶ 蔡昉，中國流動人口問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頁1。

⁷ 在中國大陸很多地區，鄉鎮企業的前身是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隊企業」（公社和生產隊所屬的企業）。二者之間的原則區別是，社隊企業施行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和就地銷售的「三就地」原則，因此，也就是不允許發展商品性的加工業，而要把社隊企業的生產限制在自給性經營的範圍內；因而，社隊企業至少從領導上的意圖說，應當屬於發展經濟學所說的「自然經濟的傳統部門」（natural traditional sector）。而鄉鎮企業是在農業已經實行家庭承包式的條件下生產和發展的，因而是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步前進的。參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2月），頁125-126。

廣大的內陸地區，鄉鎮企業還不發達，有的地方剛剛起步，有的地方還是一片空白。⁸因此，雖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得到了緩解，但矛盾並沒有根除。1980年代初，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不足200萬人。

9

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城市建設高速的加快，增加了大量就業機會，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人數增加。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化的速度也加快，而服務業則是城市吸收大量來自於鄉村的流動勞動力的主要領域，城市流入人口主要就業於非正式服務業的現象十分普遍。以現代城市服務業內容看，可分成兩大類，即傳統的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以金融業、房地產、finance、insurance和信息產業為典型，代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與方向，即是推動產業不斷升級的強大動力，也是目前都市經濟最為強勁的成長點。傳統的服務業，以餐飲、維修服務、商業零售等古老行業為典型。由於，它們與日常生活密切的關係，並不因為產業升級而淘汰，相反服務業淘汰的領域，隨著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不斷拓展，其服務方式也隨著技術進步而不斷改進。¹⁰

⁸ 李京文、汪同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與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36。

⁹ 王東昇、李亞娜，「農村剩餘勞動力良性轉移問題」，農業經濟(f2)（北京），1999年9月，頁168。

¹⁰ 鐘水映、辜勝阻，「都市服務業的發展與流動人口的就業」，人口與經濟（北京），總第122期，2000年第5期，頁35-36。

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所吸收的就業人員具有不同的特點：現代服務業的就業人員多為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而傳統服務業則由於收入低、條件差、不穩定的行業特點及計劃體制遺留下的市民身分優越意識，較難吸引市民自願加入，其從業人員多為 1980 年代以來流入城市中務工經商的農民。¹¹

近幾年數次大規模抽樣調查顯示，外出農村勞動力中 70% 以上進入城市就業。¹²從勞動力轉移的特徵看，流動的勞動力之年齡大大於勞動人口平均的水平，絕大部分是 20~35 歲之間，流動者與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水平相比，受教育的程度較高。從地區分布來看，轉移的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省內轉移，佔流動勞動力的 50% 以上。因為現在跨地找工作的訊息幾乎都依靠親戚、朋友和同鄉等社會網絡的幫助，而由於長期以來遷移行為很少見，所以社會關係大大減少了。¹³進入 90 年代以後，農民外出從事的工作已經涉及城市二、三產業的上百行業。在運輸、郵電、商業、餐飲業、生活服務等等。

1990 年代中達到每年在城鎮新就業 200 萬人的規模，為了適應這種形式，1991 年起中共勞動部、農業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農

¹¹ 鐘水映、辜勝阻，前引文，頁 35-36。

¹² 崔榮慧，「一個不容忽視的戰略問題：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研究，2001 年 7 月 10 日，<http://www.future-china.org/fcn/ideas/fcs20010710.htm>。

¹³ 蔡昉，「中國二元經濟與勞動力配置的跨世紀調整」，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北京），2001 年第 2 期，頁 190。

村勞動力開發試點」，先後在全國 8 個省市和 100 多個市縣實施，擴大了農村就業的門路，增加了就業崗位，提高了農村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促進了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¹⁴

從 1978 年起，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時期，社會就業渠道大大拓寬，城鎮和農村非農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增強，農業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才真正啟動。據統計，1978 年社會從業總人數為 4.01 億，1997 年增加到 6.96 億，增加 73.3%。必須指出，1978 年以來中國大陸就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主要歸因於農村非農產業的高速增長，歸因於農村工業化的迅速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總量也是 1984 年以後增加的趨勢更快，1978 年的 3298 萬，1984 年增長到 6583 萬，1996 年達到 1.58 億(參見 <表 3-2>)。而社會從業人員總數方面，從 1992 年起農業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此趨勢標誌提高勞動生產率已經提到農業發展的議事日程，經濟發達地區更是如此¹⁵，但 1998 年以來農業勞動力又每年增加(參見 <表 2-7>)。

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及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的問題，直接取決於城市對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及非農村的發展。一方面，大城市由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不景氣，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壓力

¹⁴ 程漱蘭，中國農村發展：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 2 月），頁 546。

¹⁵ 牛若峰，中國發展報告：農業與發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120-122。

大，各地紛紛採取傾向性政策，對農村勞動力的使用實行限制，使原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更堅固。另一方面，鄉鎮企業近幾年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數量有減無增，據農業部有關部門的資料，1998 年農村非農業勞動力總數約為 1.23 億人，1997、1998 年共減少了非農業勞動力 971 萬人，1999 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與 1998 年基本持平(增 7 萬人)¹⁶1990~1998 年，鄉鎮企業的年平均吸納就業 409 萬人，僅相當 1980~1989 年期間每年新增就業 707 萬人的 57.9%。¹⁷

<表 3-1> 鄉鎮企業單位數和就業人數 單位:(萬)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單位數	152.4	142.5	1222.5	1850.4	2202.7	2014.9	2004.0	2070.9	2084.7	2115.5
職工人數	2826.6	2999.7	6979.0	9264.8	12862.1	13050.4	12536.6	12704.1	12819.6	13085.6

資料來源：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年 2 月），頁 127；國家統計局編，2002 中國勞動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455、457。

導致鄉鎮企業就業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在經歷了 1980 年代超常規增長之後，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1983~1988 年

¹⁶ 張曉山，「農民收入與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農業經濟問題（北京），2000 年第 6 期，頁 4。

¹⁷ 農業部課題組，「21 世紀初期我國農業就業及剩餘勞動力利用問題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北京），2000 年 5 月，頁 8。

鄉鎮企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長率高達 33.7%，此後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開始放慢。1992～1995 年，鄉鎮企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率 48.9% 的紀錄，主要得益於出口需求拉動。但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鄉鎮企業的增速再度放慢，從「八五」期間年均增長 42% 下降到 1996 年的 21%，續下降到 1998 年的 17.3%。由於增長速度的放慢，就業增長也隨之下降。

二是鄉鎮企業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資金趨密，就業彈性明顯下降。1980～1988 年，按不變價格計算鄉鎮企業固定資產年均增長率 20.26%，比就業年增長率 15.57% 高出約 4.7%，而 1991～1998 年，鄉鎮企業固定資產年均增長率 21.46%，比就業年增長率 3.87% 高出約 17.6%。¹⁸

¹⁸ 農業部課題組，前引文，頁 8-9。

<表 3-2>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就業情況

年份	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		轉移到城鎮		農村非農就業	
	累計人數 (萬人)	比上年 增加幅度	累計人數 (萬人)	比上年 增加幅度	累計人數 (萬人)	比上年 增加幅度
1978	3298	-	148	-	3150	-
1979	3409	3.4	219	49.0	3190	1.3
1980	3848	12.9	346	58.0	3502	9.8
1981	4130	7.3	438	26.6	3692	5.4
1982	4354	5.4	504	15.1	3805	3.1
1983	4912	12.8	572	13.5	4340	14.1
1984	6583	34.0	695	21.5	5888	35.7
1985	7559	14.8	845	21.6	6714	14.0
1986	8534	12.9	1012	19.8	7522	12.0
1987	9309	9.1	1179	16.5	8130	8.1
1988	9950	6.9	1339	13.6	8611	5.9
1989	9957	0.07	1459	9.0	8498	-1.3
1990	10250	2.9	1577	8.1	8673	2.1
1991	10623	3.6	1717	8.9	8906	2.7
1992	12203	14.9	1877	9.3	10326.3	15.9
1993	14122	15.7	2062	9.9	12059.9	16.8
1994	14221	0.7	2257	9.5	11964.0	-0.8
1995	15026	5.7	2477	9.7	12548.5	4.9
1996	15853	5.5	2681	8.2	13172.3	5.0

資料來源：牛若峰，中國發展報告：農業與發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頁121。

第三章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城鎮就業的現況

<表 3-3> 1997-2000 年中國大陸農村轉移勞動力情況 (%)

類 別	2000	1999	1998	1997
農村轉移勞動力中農村勞動力比例	23.64	21.55	20.56	18.1
農村轉移勞動力中男性勞動力比例	65.4	66.9	67.1	65.8
農村轉移勞動力中受過專業培訓的比例	29.0	35.0	35.9	31.9
農村轉移勞動力總數量 (推算數, 萬人)	11340	10107	9547	8315

資料來源：農調對農村住戶勞動力抽樣調查；蔡昉，2002 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59。

<表 3-4> 中國大陸農村轉移勞動力年齡分佈 (%)

年 齡	2000 年	1999 年
18 歲以下	3.70	2.56
18-34 歲	59.96	59.59
35-54 歲	33.07	34.20
55 歲以下	3.27	3.65

資料來源：農調對農村住戶勞動力抽樣調查；蔡昉，2002 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59。

<表 3-5> 中國大陸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的行業分佈 (%)

年份	2000	1999	1998	1997
農業	1.50	1.89	1.20	1.93
工業	37.22	38.00	37.64	38.27
建築業	14.41	15.63	15.22	15.15
交通運輸業	5.86	5.98	5.91	5.84
郵電通信業	0.40	0.37	0.43	0.44
商飲業	11.93	11.05	9.46	9.69
服務業	12.20	12.85	11.67	11.47
文教衛生	5.44	6.31	6.61	5.78
其他	11.04	7.92	11.86	11.43

資料來源：農調對農村住戶勞動力抽樣調查；蔡昉，2002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頁60。

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方面，主要是從四川、重慶、江西、安徽、湖南、湖南、河北、貴州、廣西、等中西部地區向廣東、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蘇等東部省市流動。近年來跨省勞動力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流向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2000年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在廣東省就業的佔全國總數的51.6%；在浙江省就業的佔7.7%；在

上海市就業的佔 5.9%；在北京市就業的佔 5.1%；在福建省就業的佔 4.3%；在江蘇省就業的佔 3.5%。進入這 6 個省市就業的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佔全國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總數的 78.1%。從全國來看，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的基本格局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2000 年中西部地區流出的跨省農村勞動力佔全部跨省流動勞動力的 90%，但只吸納了 18% 的跨省流動勞動力。¹⁹

根據一些地區調查，目前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外出和常年外出的比例約各佔一半，其中外出的時間在 3 個月以上的佔 16%，3 6 個月的佔 24.6%，6 個月以上的佔 59.4%，在全部外出勞動力中，外出的時間 10 個月以上的佔 53.2%，經常性季節性外出的佔 39.8%，零星外出的佔 7%。總合來看，當前的城市流動人口，一類是伴隨經濟發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動人口，他們在城市停留的時間一般較短，這類流動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輻射範圍所決定，時間和空間分布相對平衡；另一類就是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的勞動力，這類流動人口的規模大，在城市停留的時間長，且出現定居化、家庭化趨勢。後者通常依其戶口登記狀況被稱之為「暫住人口」或「外來人口」。²⁰

¹⁹ 蔡昉，2002 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62。

²⁰ 蔡昉，前引書（2002 年 6 月），頁 213。

<表 3-6>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的區域結構 (%)

流出地 流入地	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		總計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2000	1997
東部地區	7	8	49	46	26	28	82	82
中部地區	2	3	6	4	2	2	10	9
西部地區	1	1	1	1	6	7	8	9
總計	10	12	56	51	34	37	100	100

資料來源：農調對農村住戶勞動力抽樣調查。蔡昉，2002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頁62。

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速度快慢，從根本上取決於農業相對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如果差距大，轉移的拉力就強，反之亦然。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是，自1990年代以來，兩者相對差距在1980年代有所縮小的基礎上又呈擴大的趨勢。1998年非農產業勞均國民生產總值(GNP)是農業勞均GNP的4.53倍，不僅比1990年的3.93倍明顯擴大了，甚至超過了1995年4.20倍的差距。²¹

據統計，1978-1996年，城鎮經濟增長共創造了1億的新的就業崗位，年平均吸納勞動力529.4萬人。但城鎮就業機會增長對吸收農

²¹ 農業部課題組，前引文，頁8。

業剩餘勞動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中，由農村轉入累積只有 2681 萬人，僅佔城鎮從業人員累積總數的 15.11%，絕大多數城鎮就業崗位被城鎮勞動力所佔據，為 84.89%。²²

1990 年至 2001 年，中國大陸從業人員規模從 6.5 億人擴大到 7.3 億人，增加 8300 萬人，然而，由於勞動力供求之間的不平衡，就業問題仍然將是現在和今後長時期內需要中共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像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所說，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成爲一個問題應該說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是統分統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市場化、國營企業實行關停併轉改革、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等的結果。²³

據中共統計局與農業部的最新調查，2001 年農村外出勞動力爲 8961 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爲 18.6%；佔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爲 4.54%²⁴，2002 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 9400 萬人，比 2001 年的 8961 萬人增加約 470 萬人。全年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就業的人數比上年增長 5.24%。²⁵

²² 牛若峰，前引書，頁 122。

²³ 慧丰，「解決就業任重道遠」，人民網(北京)，2002 年 11 月，19 日，<http://peopledaily.edu.cn/BIG5/guandian/26/20021119/869401.html>。

²⁴ 范小玉，「2001 年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2002 中國發展報告(北京)，2002 年 7 月，頁 180。

²⁵ 北方網(北京)，2003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2003/01/16/000492392.shtml>。

第二節：農村勞動力城鎮就業的主要類型

本節要討論的主要的問題，即農村勞動力²⁶是怎樣外出？此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信息傳遞和組織過程的問題。呈現出由親緣、地緣到業

²⁶ 同樣是農村戶口的農民，在職業上已經出現明顯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也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一些學者指出農業戶口的農民（更確切地說是農村人口）已經分化為八個階層：（1）農業勞動者階層。他們承包集體耕地，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勞動，全部或大部分依靠農業取得生活來源。他們是中國大部分農村的主體勞動者。（2）農民工階層。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但戶口仍然是農業戶口，有承包田，身份還是農民，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補貼，不享受公費醫療等勞保待遇。這一階層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外出就業的農民工和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他們的人數僅次於農業勞動者。（3）雇工階層。這是現階段農村的工人階級，他們受雇於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4）農民知識份子階層。在農村從事教育、科技、醫藥、文化、藝術等智力型職業的知識份子。（5）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即農村擁有某項專門技術或經營能力，自有生產資料或資金，從事某項專業勞動或經營小開型的工、商、服務行業的勞動者和經營者。（6）私營企業主階層。即企業的生產資料私有、自主經營，以盈利為目的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業主。（7）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即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經理、廠長以及主要科室領導和供銷人員。他們有集體企業的經營權、決策權，是鄉鎮企業的管理者。隨著農村鄉鎮企業的繼續發展，這個階層的人數和勢力正在迅速發展之中。（8）農村管理者階層。即鄉村兩級的農村基層幹部，是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組織者、管理者。這樣龐大的社會群體的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靠著這幾十萬個農村基層黨政組織、幾百萬農村幹部的工作。根據有關抽樣調查和有關統計資料推算，上述八個階層在農民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約為：農業勞動者占55—57%，農民工占24%，雇工占4%，農民知識份子占1.5—2%，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占5%，私營企業主占0.1—0.2%，鄉鎮企業管理者占3%，農村管理者占6%。蘇長權，中國農業信息網（北京），2002年10月29日，http://www.agri.gov.cn/llzy/t20021029_19342.htm。

緣的遞次牽動關係，而包工頭群體的出現，則展現了外出就業信息獲得與組織特徵的市場化趨勢。²⁷

相當大量的國內外證據表明，以尋找就業為目標的勞動力遷移不是盲目的。這個方面國外的學者已經積累了不少資料。在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整個城市範圍的調查，還是對城市貧民區的專門調查，結論都顯示，遷移者通常是在較短的時間裡，就獲得了在遷移地的就業機會。²⁸但是，中國大陸的勞動力遷移表明，遷移者並不是靠一般性信息做出的決策，相反，他們在做遷移決策時，一般性信息並不重要。通常在事先已經找好了工作，或者至少得到了確切的就業機會信息，已獲得了最初生活的保障。²⁹

一定的就業信息網絡和就業組織網絡的形成，是勞動力市場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也是其發育成熟的重要標幟。目前外出的農村勞動力主要是在自組織性的血緣與地緣網絡中流動，在這裡，將深入分析這種自組織的過程和它可能的演化趨勢。

壹、農村社會的鄉土特徵

農村社會進步到今天，仍保留著社會學意義上的某種鄉土性質。而這種性質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信息傳遞方式和組織方式的影

²⁷ 杜鷹、白南生，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11月），頁84。

²⁸ 蔡昉，前引書（2000年7月），頁167。

²⁹ 蔡昉，前引書（2000年7月），頁168-169。

響極深，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信息與組織主要是由親緣、地緣關係來牽動的。中國大陸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農村改革是從農戶家庭承包責任制真正開始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家庭經濟的一種模式。家庭經濟，即以家庭為一個生產經營單位，它不是由一般的市場契約結合而成，而是以血緣和婚姻紐帶組成的。³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引起農村管理體制連鎖反應，到 1984 年，導致實行了 25 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壽終正寢。這對農民來說，無異是獲得了又一次的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對他們的行動造成的一些限制。第一，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第二，農民獲得了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的自主權，可以自由流動，可以從事農業，也可以從事其他產業。第三，農民獲得了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³¹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親緣、地緣關係牽動在減弱，緣於市場萌生的業緣關係的牽動則在增強。

費孝通早就指出了，中國鄉土社會結構中的人際關係特徵，是以「己」為中心層層外推的，每個人都是圈子的中心，每個圈子都有遠近、親疏的不同，就像是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一圈圈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鄉村中的每個人都有以他自己為

³⁰ 程漱蘭，前引書，頁 382。

³¹ 蘇長權，中國農業信息網(北京)，2002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agri.gov.cn/llzy/t20021029_19342.htm。

中心的社會關係圈層，並且一個人形成的社會關係圈層不同於另一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也是不相同的。因此，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呈差序格局，在這裡親緣地緣關係起著支配性作用。³²

那麼，現階段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狀況怎樣呢？中國社會學者一般認為，中國社會目前正處於轉型時期，或者說，中國社會目前是一個轉型社會，即處於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

從以下的分析中將會看到，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主要由家庭成員、親戚及同鄉牽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業緣關係的契入表明市場的作用在逐步加強。

貳、親緣、地緣關係與外出就業

中國的鄉土社會是特別重視以家庭為紐帶的親緣和地緣關係的。中國老一輩學者幾乎都把「家庭」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網路的基本單位。這種對親緣、地緣關係的重視，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成為一種「習性」，並具有很大的慣性。這種「習性」沒有因生活地點從農村到城市的變動或職業由農民到工人的變動而改變；也沒有因擁有了一定的工商業生產資本，成了雇用他人的業主而改變，如北京南郊一帶形成了浙江個體戶聚居的「浙江村」；甚

³²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 84-85。

至也沒有因生活遷居到異國他鄉而改變，在巴黎、倫敦、三藩市這些國際大都市，都有中國人聚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城（China Town）」。³³

在現實社會裏，人際交往一般是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紐帶的。因此，人際關係相應地可以區分為血緣關係、地緣關係和業緣關係。所謂血緣關係，是指人們之間經由婚姻和血緣紐帶所結成的互動關係，如家庭關係、親戚關係。地緣關係是指人類社會的區位結構關係，或者說以空間和地理關係為紐帶結成的人際關係，如同鄉關係、鄰里關係。³⁴

親緣關係在一個社區勞動力外出史的早期階段上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目前勞動力外出的各種方式中也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為什麼通過親緣關係獲得最初信息的外出勞動力的比例這麼高呢？這道理在於信息是有價的，但是在一個家庭或親屬的範圍內，「親兄弟、不算帳」，這個交易費用也就被內部化了。而且由於「親不親、一家人」，信息的準確程度也大體是牢靠的，這樣自然使流動成本和風險成本降到了最低。許多村民在外出打工前沒有出過縣，沒有坐過火車，對外界的情況，對城市的環境很不熟悉，若有家人在外地工作，

³³ 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http://www.unesco.org/most/chlipei.htm>。

³⁴ 黃少華，「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韓華大學(台北)，2002年3月，<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1/21-04.htm>。

既可以提供可靠的就業信息，也可以在萬一就業失敗的情況下有退路可尋。³⁵

但是僅憑親緣關係傳遞外出信息，畢竟太受局限。這種局限性對每個有外出意願的家庭都是可以感受到的。何況在一個聚族而居的村落裡，所謂地緣又往往是親緣性的地緣。因而隨著外出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出的信息渠道和組織網絡便自然從親緣擴展到了地緣。

這樣的情況之下，從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方式上，有了一種獨特的方式。便是像「浙江村³⁶」、「河南村」、「新疆村」等的一種基本屬於自己的準社區。其中，「河南村」、「新疆村」是像國外的「唐人街」，一個聚集的人口群體；這一聚集的人口群體都是外來的同一省份的農民；並共同居住在一個地域範圍之內，屬於社區型的模式。但是，比較特殊的「浙江村」不僅是一個聚居地，而且聚居促成了一種新的產業組織形式的產生，從而使其成為一個產業基地，屬於產業—社區型模式。³⁷

³⁵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 87。

³⁶ 它的得名，是由於那裡聚居了大量來自浙江省的農民之故。從廣義上來講，“浙江村”應指進京務工經商的浙江人形成的所有聚居區，這樣的聚居區有幾個，它們分布在北京市的朝陽、海淀、豐台等區，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位於豐台區南苑鄉大紅門地區。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項飈，「“浙江村”中國農民進入城市的一種獨特方式」，社會學研究（北京），1997 年第 1 期，頁 57。

³⁷ 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項飈，前引文，頁 56、65-66。

地緣關係對農村勞動力的外出也起著重要作用。有地緣關係的人之間，也可能同時包含著親緣關係，比如堂兄弟，既有親緣關係又有地緣關係。在這裡所指的地緣關係是指不含親緣關係的地緣關係，如果同時有親緣關係的話，就劃入親緣關係中。在農村，除了家庭這一初級群體外，村落是一個基本的生存、生產和生活單元。由於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社區中，村落中的人頻繁互動，有一定的感情基礎，有自己共同的利益。因此同一村落中的人常常相互往來和相互幫助，也很容易在相互影響中對外界事物達成共識。1950年代以來，由於實行了生產隊 - 大隊 - 公社（改革後的村民小組 - 行政村 - 鄉或鎮）這樣一種行政區劃結構，村民的互動範圍除了傳統的村落，常常擴展到大隊（行政村）一級。³⁸

農村外出勞動力組織牽動上的這種地緣性，已經被許多人注意到了。這不僅表現在同村的人外出的互相提攜，因而同村人外出，跑到一個地方去的不少，而且表現在村莊之間，往往此村的人外出多，彼村的人外出少。

例如，在濟南市打工的省內外民工中，依靠親友提供就業信息的，佔民工總數的80%以上。或者不如說，農民向城市的遷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靠他們的社會關係幫助實現的。³⁹

³⁸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88。

³⁹ 蔡昉，前引書（2000年7月），頁169-170。

<表 3-7> 遷移者決策的信息來源 (%)

類 型	本省	外省	合計
城市居民的親屬或朋友	31.3	24.5	30.9
在城市打工的同鄉或朋友	31.5	51.0	32.9
村裡的親屬或朋友	13.0	5.9	12.5
外地親屬或朋友	4.6	6.9	4.8
新 聞 媒 體	2.7	4.9	2.9
招 工 廣 告	2.1	2.0	2.1
當 地 政 府	3.1	0.0	2.9
招 工 隊	10.3	2.0	9.7
其 他	1.3	2.9	1.4
合 計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山東濟南抽樣調查（1995）蔡昉，中國流動人口問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頁169-170。

在地緣關係牽動的農村勞動力外出中，信息提供者在某種程度上還擔當了保護人的角色。由此可見，地緣關係的牽動，在更大範圍內為外出勞動力提供了方便，使外出者離開本社區以後依然得到了來自同鄉關係圈的關照和保護。因此可以說，依託於地緣關係，勞動力外出的信息源擴大了，進而信息的準確性程度和外出的穩定性程度提高了，風險進一步減少。⁴⁰

⁴⁰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89。

就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來看，他們首次外出主要通過親緣、地緣關係牽動，具有如下一些原因。

農村地區依然比較封閉。在外出之前，村民們常年在土地上勞作，只是偶爾上上街，趕趕集。農村人口流動較少，因此他們所擁有的社會關係比較少，獲得的資訊也比較有限。對在較為封閉的環境中生活、擁有關係資源較少的人（尤其是從未外出的人）來說，親緣、地緣關係最有可能被開發利用的。

首次外出的農村人，通常比較求穩。1980 年代開始，到 1990 年代達到高潮的外流農村勞動力，不同於歷史上的盲流。他們在家有飯吃，但不富裕外出去掙錢。首次外出沒有可靠的資訊，沒有可靠的人的幫助，對外邊的情況又不熟悉，想在短時間內找到工作，賺回路費，掙錢回家，並非易事。通過已有的親地緣關係，特別是至親關係，是實現這一掙錢目標的最佳手段。⁴¹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獲得飛速發展，科層組織體系的末梢觸及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資訊的傳遞以驚人的速度加快，資訊傳遞的成本則以驚人的幅度降低。過去中國農村中的老農，其一生的生活半徑往往只是村莊方圓的幾公里，而現在通過電視和廣播，中國的農民可以和紐約的市民收看同一場體育比賽的現場直播。然而，在那些關係農

⁴¹ 陳阿江，「從農村勞動力外流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及其變遷」，<http://www.chinaresettlement.com/paper/ruralabor.htm>。

民切身利益的個人決策中（如職業選擇），農民根據的主要資訊來源依然是親屬和朋友。⁴²

參、業緣關係與外出就業

這裡所指的業緣關係主要是指除了親緣、地緣關係以外的職業關係，則是指以社會分工為基礎而形成的職業人際關係，如同事關係、師生關係、包工頭、政府部門及工式組織的招工等。

包工頭的出現，使農村勞動力外出的信息獲得與外出組織方式再次發生了某種質的變化。包工頭與他的僱工大多有地緣關係，有的可能會有親緣關係，但是包工頭帶人外出，不象普通人那樣純粹是出於義務，出於一種親幫親、鄰幫鄰的傳統道德情感，他當然要考慮親情鄉情關係，但他更要考慮他的事業的需要，這自然要使他的立足點轉向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當包工隊發展壯大之後，包工頭與僱工的關係，便主要是一種職業的-即業緣的關係了。⁴³

由於包工頭來自農村，因此在開始的時候，包工頭招工往往主要從同鄉中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包工隊規模的擴大、流動性增強之後，包工頭與工人的關係，便非得以市場契約關係的形式來約束，親情鄉情關係也隨之淡化。

⁴² 李培林，前引文，<http://www.unesco.org/most/chlipei.htm>。

⁴³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 90。

這種由業緣的經緯編出的信息和組織之網，進一步擴大了外出就業的覆蓋面，而包工頭就是這蛛網上的蜘蛛，成為溝通城鄉就業的橋樑。從這個意義上說，包工頭從血地緣關係中脫穎而出，已經是勞動力市場上最初的仲介機構（市場仲介人）了。但是，包工頭作為仲介人，與通常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市場仲介組織，仍然有著本質的區別。目前由包工頭牽動外出的農村勞動力約佔總數的 10%。⁴⁴

<表 3-8> 深圳“打工者”初次市場進入的途徑

親友介紹	集體招工	市場招聘	其他
41.2%	26.4%	18.5%	13.9%

資料來源：深圳外來勞動力管理狀況調查（1996）。時憲民，中國沿海經濟中心城市勞動力流動與體制選擇—深圳特區流動勞動力管理研究，<http://www.unesco.org/most/chshix.htm>。

<表 3-8> 顯示，「親友介紹」同樣成為「打工者」初次進入的最常用方式。而且，在調查中發現，許多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親友關係鏈常常被廠方用作一種有效的招工策略。這篇文章裡調查的有一企業，老闆就是讓員工回自己的家鄉去招工，然後按招工的數量付給「人頭費」。與其他的方式相比，「親友介紹」對企業來說

⁴⁴ 杜鷹、白南生，前引書，頁 92。

是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都較低的一種招工方式，而且，這種方式使企業有可能規避勞動管理費用，但是，這種方式帶來了令勞動管理部門頭痛不已的「非法用工」問題。勞動合同的簽定率低，勞動糾紛的發生率高等勞動關係問題是與這種非規範化的用工關係有著很高的關係。⁴⁵

以上述的狀況來分析，農村流動人口去城鎮找工作的時候，會考慮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可分成收入方面的因素與支出方面的因素。收入方面有外出收入信息、就業信息、自己的勞動素質，支出方面有考慮到自己現有的收入的部分與在外地要支出的部分。就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是一個很複雜的決策過程。這些要考慮的因素可做一個圖示（參見〈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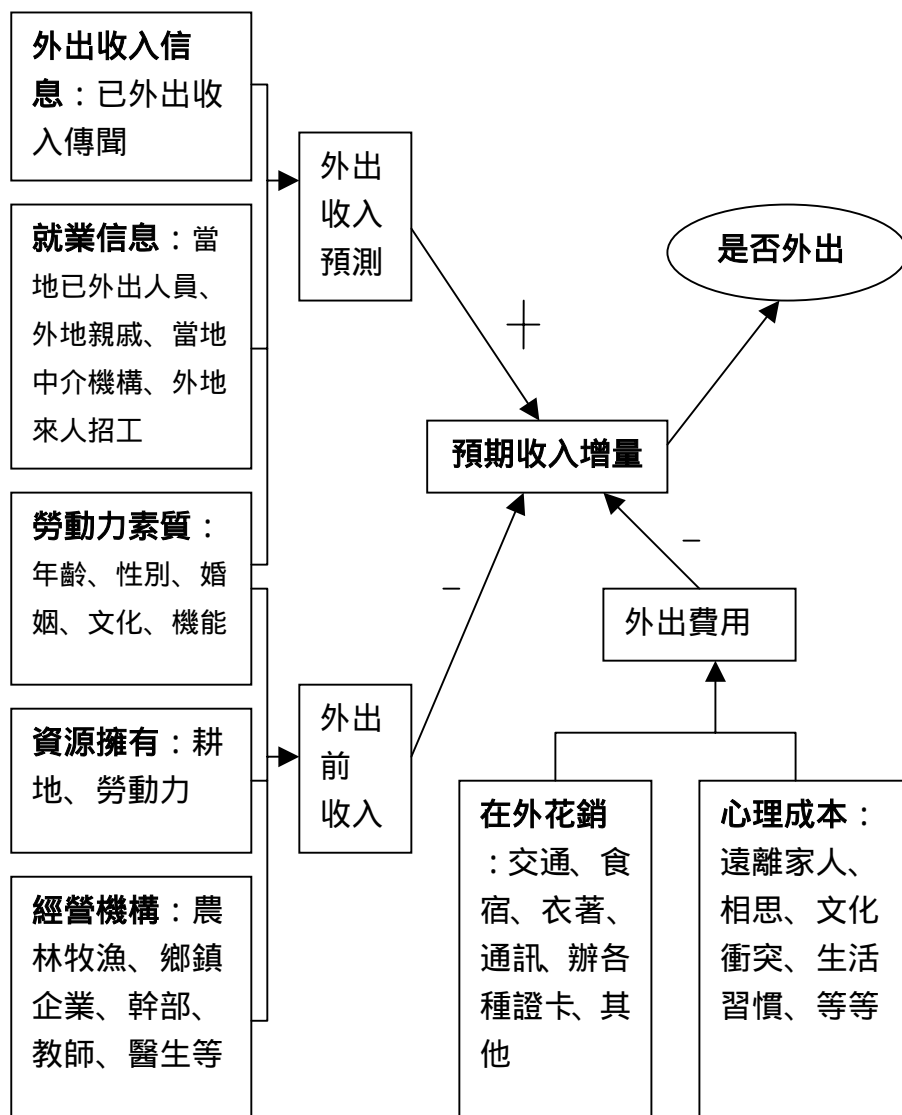
依吾人之見，目前農民流動的理性越來越高。他們外出有明確的意識，那就是賺錢，去發財；有明確的目的地，要去的地方事先已有了初步的聯繫；外出做甚麼，事先已有了明確的打算和設想；外出還有親朋好友相助，血緣、地緣和人員關係形成了流動群體的紐帶。真正意義上的「盲流」很少，因為這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⁴⁶

而且在將來的勞動力市場上，傳統的農民依託著傳統的組織資源

⁴⁵ 時憲民，中國沿海經濟中心城市勞動力流動與體制選擇—深圳特區流動勞動力管理研究，<http://www.unesco.org/most/chshix.htm>。

⁴⁶ 陳文科、熊維、朱建中，中國農民問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頁161。

才能一步步地完成從血緣到地緣、從地緣到業緣的人際關係轉變，最終脫穎而出。因此，以國家層次來創造良好的環境使勞動力市場發育是非常重要的。



< 圖 3-1 > 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課題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決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社會學研究（北京），1997年第1期，頁26-27。

第三節：農村勞動力對城鎮經濟發展的影響

1980年代中期以來，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目前的理論和政策討論已經揭示，遷移者具有較強的生產性和活動性，其轉移過程也是符合經濟理性的。然而，鑒於迄今為止存在著對於勞動力流動的一些疑慮甚至非難，有必要進一步考察這個遷移和流動過程在宏觀意義上是否也是積極的。本節並不準備對於那些諸如流動人口犯罪率高低、流動過程是否具有盲目性等問題給予直接回答，而只是結合中國大陸勞動力流動發生的背景，從其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等角度揭示這個過程的不可避免性。⁴⁷

壹、對遷入地的影響

改革之前，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並相應形成了阻礙勞動力城鄉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造成扭曲的產業結構、扭曲的城鄉人口分佈結構，使中國大陸城市化水平大大滯後於相應的發展階段。對於城鄉間和區域間人口和勞動力流動來說，傳統體制形成了兩重障

⁴⁷ 蔡昉，「勞動力對市場發育、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網，(2000年6月10日)，<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礙。第一，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增長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弱；第二，計劃配置勞動力的體制為勞動力在產業間和區域間的轉移設置了牢固的樊籬。其結果是，改革以前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雖然國民經濟的產值構成發生了變化，農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從 1952 年的 57.7% 下降為 1978 年的 32.8%。就業結構的變化卻大大滯後，農業勞動力比重僅從 1952 年的 83.5% 下降為 1978 年的 70.5%。⁴⁸

在目前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城市化也以雙軌制的方式進行。在計劃軌道內，城市化速度受到戶籍制度的嚴格控制，其規模並不足以矯正扭曲的城鄉人口分佈結構。因而計劃外的遷移和流動成為必要的補充。需要指出的是，計劃外遷移和流動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反映在城市化的統計數字中，但其實在地推動著實際的城市化進程，即流動勞動力在不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情況下，已經為城市發展作了巨大的貢獻。⁴⁹

農村人口流動，為農村中過剩的勞動力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一方面大大緩解了農村的就業壓力，有利於農業實現規模經營，加快了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農民外出打工不僅賺到了票子，取得了效益，而且通過做工、做事，在發達地區，在城市接受現代文明的教

⁴⁸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⁴⁹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育和市場經濟的洗禮，開闊了眼界，改變了價值觀念。通過外出民工帶回家鄉的金錢、技術、信息、管理經驗、全新的觀念而帶動一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例子是很多的。許多農民在多年的打工變經營，從幫工變老闆的演變。許多家庭出去一人，全家脫貧。比如，浙江省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從 1985 年的 187 美金，上升到 1998 年的 460 美元。⁵⁰可說，農民流動的自身意義和社會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對社會結構變遷的正面影響是巨大的。

民工潮對社會結構變遷也造成了不少消極影響，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譬如，就業壓力、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社會秩序混亂、計劃生育失控等。農民流動人口加重了交通運輸和城市基礎生活服務設施的負擔，使本來十分緊張的城市基礎設施如住房、通訊、教育等等問題更加突出。⁵¹特別是，因為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國營企業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採取改革措施，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入城市就業越來越困難。⁵²

但是大多數民工並不知道城裡的實際需要，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就盲目奔向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雖然這種盲目的趨勢越來

⁵⁰ 賴存理，「農村勞動力流動及其對土地利用的影響-以浙江為列的分析」，浙江學刊(杭州)，2000 年 5 月，頁 84。

⁵¹ 羅玉達，「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現狀及其出路研究」，貴陽師專學報(貴州)，2000 年 3 月，頁 12-13。

⁵² 張道中，「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流動中的幾個問題」，經濟學家(成都)，2000 年 4 月，頁 97-98。

越少)，一些農民流動人口在走向城市的過程中受到挫折，社會適應失敗後，很容易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於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遊蕩著一些身無分文，又無長技且無事可做的農民工，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最近中國大陸城市和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賣淫、嫖娼、賭博、販毒等各種犯罪活動，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員作案。⁵³

但是，民工的流動有利於遷入地經濟發展尤其是非國營經濟的發展。而且為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該廉價勞動力，成為當地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深圳經濟特區，「農民工」至少佔到總人口的 50%。廣東省近年經濟的騰飛，除了得益於開放政策外，還得益於幾百萬外省農民工的流入。農民工的流入，還極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現在生活在大城市的市民，雖然許多人對農民進城仍有不少抱怨，但誰都不能否認，自己的日常生活與農民工的聯繫日益密切了，越來越離不開他們了。⁵⁴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大量農民工的存在，為城鎮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促進，準備了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加快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建立了一個機制，特別為勞動密集型產業

⁵³ 何清漣，現代化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5月），頁253-254。

⁵⁴ 韓俊，「民工潮-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投資中國月刊，<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ina/199406-005/199406-016.htm>。

的發展提供了條件。⁵⁵。

改革開放以後，許多城市隨著社會經濟事業的迅猛發展，就業環境相對寬鬆起來，出現了「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結構性就業矛盾，一些行業在城市招工非常困難，如建築、搬運、環衛、服務業等，正是農民工迅速填補了這些就業空間。在北京的建築市場上，每年都有 40 多萬農民工在約 1000 萬平方米的建設現場工作。據調查，深圳、南海、上海等地的樓宇、交通及其基礎設施，有 80—90% 是外地流入的農民工建的。而廣東省中山市的 35 萬農民工，已經佔到全市職工人數的一半左右。⁵⁶

農民進城打工，有利地衝破了城鄉分割的社會結構，打破了人才和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陳規戒律，推動了城市勞動力職業競爭，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注入了一個巨大的推動力。且農民人口流動，推動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⁵⁷

這些有利於遷入地的因素，慢慢帶動市場的繁榮，突破了傳統的城鄉封閉、區域間的僵硬格局，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

但是。有些人士對此現象表示困惑：此現象始於 1980 年代末，並迅速由一種陣發性現象演繹成週期性的潮汐，每年的春節前後，民

⁵⁵ 羅玉達，前引文，頁 12。

⁵⁶ 余雲霞、付麟，邁向 21 世紀：中國就業新概念（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201。

⁵⁷ 羅玉達，前引文，頁 12-13。

工們都像候鳥一樣從城市到鄉村，再從鄉村向城市大量遷徙。民工們的流動性太強，不但給自己的二度找工作帶來了難度，而且也給人一種不可靠、不穩定的感覺。這種狀況不但不利於保護民工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也不利於勞務市場誠信度的確立，更不利於長遠發展，長此下去，民工永遠都只能是民工，永遠都處在一個「漂流」的狀態中。

58

貳、收入分配與區域發展

東中西部⁵⁹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問題。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東部和西部，大家都發展了、都富裕了，但差距似乎更擴大了。

過去的經濟改革具有區域間的差異性。在 1970 年代未改革開放之時，中部地區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例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國營企業放權試驗都是從中部地區開始的。當改革進入到價格、財政等較宏觀層次的時候，東部地區開始得風氣之先。最初的對外開放特

⁵⁸ 黃茂軍，「民工-永遠的流動？」，經濟觀察報，2002 年 3 月 4 號，<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714>。

⁵⁹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分類，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等 12 個省市區；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 9 省區；西部地區則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雲南、貴州、四川、西藏和 1997 年新設立的重慶直轄市等 10 省市區。參見徐逢賢，跨世紀難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16。

區、開發區也都建立在東部地區。特別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在東部地區具有較好基礎的鄉鎮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沿海地區發展戰略的實施又給予了東部地區諸多特殊政策，使得改革和發展的重心都集中到了東部，同時中部和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後了。這種改革和發展的區域梯度性導致了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衡。⁶⁰

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突出的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從東至西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東部地區都遠遠高於中西部地區。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東西部地區差距的絕對值來看，1978 年東部地區高於西部地區 106 元；1985 年相差 477 元；1992 年相差 1164 元；1995 年相差 3286 元。在 18 年間絕對額差擴大了 31 倍。⁶¹

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轉移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不平衡，其突出的特徵之一也首推東中西部的梯度差異。東部地區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規模、速度等許多方面都明顯地走在中西部地區的前面。

<表 3-9> 有反映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變化狀態。表中農業勞動力是廣義的農業勞動力，即是農林牧漁業勞動力。1984 年到 1988 年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急速推進的階段，這一時期鄉鎮

⁶⁰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⁶¹ 徐逢賢，前引書，頁 44。

企業迅猛發展，同村居民外出打工的人數也增加，相對農業勞動力佔鄉村勞動力比重也下降。⁶²從三大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農業勞動力佔鄉村勞動力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91.6% 下降到 2000 年的 61.6%；中部地區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94.2% 下降到 2000 年的 74.2%，比東部地區少下降 10%；西部地區的比重從 1980 年 96.4% 下降到 2000 年的 77.5%，比中部地區少下降 1.1%。

<表 3-9> 分地區鄉村農業勞動力總量與結構變動情況（萬人）

地區	1980 年	1984 年	1988 年	1992 年	1996 年	2000 年
東部	12316.5 (91.6)	12692.3 (83.9)	11725.9 (70.3)	12486.8 (69.5)	11529.8 (62.8)	11492.8 (61.6)
中部	9914.8 (94.2)	10744.5 (90.1)	10953.2 (82.3)	11933.2 (81.5)	11436.9 (74.5)	12080.3 (74.2)
西部	7577.1 (96.4)	8248.2 (92.6)	8776.6 (87.2)	9617.0 (87.6)	9293.9 (80.2)	9166.0 (77.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北京），<http://www.stats.gov.cn>。

從這三大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差異，可看東中西部城鎮化的程度有十分明顯的差異。中國大陸工業化的發展與小城鎮的發展有緊密

⁶² 曹陽，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武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71-172。

的依存，因此小城鎮人口的增加大部分來自於鄉村轉移的勞動力。這意味著小城鎮人口增長迅速的地區吸納了相當數量的鄉村人口。⁶³這些不平衡的表現會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城鄉居民的就業機會及收入有明顯的差異。

<表 3-10> 地區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

年份	人均 GDP (元)	人均 GDP 基尼係數	人均收入 (元)	人均收入 基尼係數
1978	359	0.244	164	0.126
1980	414	0.239	217	0.112
1985	660	0.232	376	0.111
1990	892	0.241	443	0.145
1991	975	0.244	464	0.141
1992	1135	0.254	509	0.148
1993	1331	0.261	551	0.163
1994	1523	0.270	607	0.169
1995	1715	0.275	656	0.167

資料來源：蔡昉，「勞動力對市場發育、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網，(2000年6月10日)，<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以省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基尼係數可以反映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及其變化趨勢（見 表 3-10）。這種地區差距在東

⁶³ 曹陽，前引書，頁 174。

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表現得更加顯著。1978年，東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4.9%，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5.9%和29.4%，1995年，東部地區超出平均水平的程度達到48.5%，而中部和西部地區低於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分別下降到23.8%和38.1%。⁶⁴

從國際經驗和現實趨勢來看，收入分配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在近期內不會自動得到調整。關於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的變化規律，有一個著名的庫茲涅茨倒U字型假說。庫茲涅茨在國際範圍內比較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之間的關係，揭示了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先擴大，達到一個轉捩點繼而縮小的趨勢。威廉森按經濟大區和州計算的1840—1961年期間美國區域間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的變化結果表明，區域間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也遵循一個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字型軌跡。進而，威廉森還通過比較法國農民工資水平差異和勞動生產率差異，間接看到了在區域間收入分配趨勢與區域間發展水平差異狀況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係。因而可以推斷，一國內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程度也會隨時間（發展水平）而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字型演變軌跡。因此，在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程度達到一個最高值以前，存在一個持續提高的區間。由於1980年代至今中國大陸地區間

⁶⁴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發展差距和收入差別都在擴大，在這種不均等和不平等程度達到最高值以及開始降低以前，地區間以及城鄉間的遷移動力將仍然很大。⁶⁵

理論上，有兩種機制可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別。其一，隨著市場的發育，國內統一市場的建立，各地區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通過區域貿易，以充裕的生產要素換取稀缺的要素。在這個過程中，各地的生產要素價格和報酬趨於一致。其二，隨著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生產要素在各地之間流動，從而改變生產要素佔有水平不平衡的狀況。那些市場障礙較小，流動性較強的要素通常率先流動起來。一方面，提高勞動力相對多的低收入地區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抑制勞動力相對缺乏的高收入地區工資水平過快上漲。目前，在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育水平尚不足以緩解區域間收入差距的情況下，由於人民公社的解體、城市食品供給體制的改革，以及城市住房改革的開始等，低生活費用和補貼制度開始改革，生活資料的市場化導致居民生活資料價格提高，而遷移者生活資料價格下降。其結果是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大大減少，因而勞動力流動縮小區域差距的均衡機制發揮了較大作用。⁶⁶

由〈表 3-11〉的文獻探討，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階段與城鄉發展差距的關聯分析可以得知，影響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既

⁶⁵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⁶⁶ 蔡昉，前引文，<http://202.130.245.40/chinese/renkou/75112.htm>。

有長期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一包括經濟改革各階段政策上的因素。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日深，受到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加明顯。

67

⁶⁷ 高安邦、黃智聰、楊思茵，「中國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5 卷第 4 期，2002 年 7、8 月，頁 29。

<表 3-11> 影響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之相關文件

作者	研究對象與範圍	衡量指標	重要影響因素
中國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 (1994)	1980 年 1993 年全大陸城鎮及鄉村	鄉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二元經濟結構, 鄉鎮企業發展, 城鄉人口比例
Kwong (1994)	1986 及 1988 兩年大陸 29 省市及自治區的城鄉資料	城鄉居民所得比率	農產品銷售量, 鄉村工業化
趙人偉、李實 (1997)	1988 及 1995 兩年在大陸 30 個省分實地抽樣調查數據	基尼係數	城市非國有經濟的較快發展, 農產品低價收購政策, 農業稅等政策因素
Xue (1997)	1978 至 1995 年大陸各城鄉資料	鄉鎮居民收入比率 鄉鎮消費開支比率 鄉鎮儲蓄比率	農產品相對低價以及農業的相對緩慢成長, 城鎮工資的快速增長, 城鎮企業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下降, 政府對農業投入減少
向書堅、李麗 (1998)	1981 至 1996 年全大陸鄉鎮及鄉村	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	第一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鄉鎮企業值工增長率, 國家財政對農業支出的增長率
蔡繼明 (1998)	1987 及 1995 年全大陸鄉鎮及鄉村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鄉鎮居民比較生產力
Khan and Riskin (1998)	1988 及 1995 兩年在大陸 30 個省份實地抽樣調查數據	基尼係數	農村非生產性工資收入, 城鎮住房及各項津貼補助
李實 (1999)	1995 年大陸 19 個省份所做的百分之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農村外出勞動力
吳德美 (1999)	1992 年至 1997 年全大陸城鎮及鄉村	城鄉居民人均可至支配收入比例	鄉鎮企業就業機會, 工資收入, 地區因素
Yang (1999)	1986、1988、1992 及 1994 年四川及江蘇兩省統計資料	基尼係數	鄉鎮居民福利保障制度, 農村居民有土地使用權卻無轉讓權, 城鎮財政補貼制度
Jeanneney and Hua (2001)	1982 年至 1996 年大陸 28 個省份的城鄉資料	城鄉居民收入比例	家庭承包責任制比例、城鄉實質工資相對比率, 工農產品國際價格變化率

資料來源：高安邦、黃智聰、楊思茵，「中國大陸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5 卷第 4 期，2002 年 7、8 月，頁 22。